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追求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

本报记者 陈学慧



- ◇ 此轮经济增长减速是“周期性”、“政策性”，还是“结构性”？
- ◇ 何谓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
- ◇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配合？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1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论文奖。

李扬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1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论文奖。

侧记

“全面”的李扬

陈学慧

采访李扬，是在2012年的最后一天。

当天，中国社科院再次组织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学习结束李扬欣然接受了我们的独家采访。在洒满阳光的办公室里，李扬兴致很高，谈到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点的理解，十分兴奋。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没有水分、产能过剩；结构性减速、摩擦性失业，李扬逐词解读。

“从经济学上看”，李扬喜欢用这个词，而那些看似深奥的经济学理论，被他“掰开揉碎”地讲出来，显得通俗易懂。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试图从李扬对每个经济问题的回答中不仅学到他的真知灼见，更想学到他“解题”的轨迹、思考问题的方式。

“全面”，李扬这样评价自己。看问题，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偏颇，而是从多个角度，甚至换个角度来审视。

“全面”取决于李扬的学术背景。大学学的是经济学，读硕士研究的是货币金融学，读博士研究的是财政学。这样的知识结构让李扬对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更深的理解和研究，也让李扬能够横跨金融学和财政学两大领域；

“全面”还取决于李扬的学习方式。李扬十分感谢他在复旦大学的导师，已故著名货币金融学家陈观烈教授。导师不仅给予他在学术道路上的指引，更是教会他要读原著。正是在复旦，他通读了全套凯恩斯理论原著，包括凯恩斯的自传。他还根据导师的要求，到上海财贸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旁听财政学，在研究生期间已将货币金融学和财政学融汇起来；

“全面”也取决于李扬的勤奋。他曾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论文奖，已出版专著、译著23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编大型金融工具书6部。主持国际合作、国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项目40余项。这样的高产让李扬的理论功底更加深厚，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也更加紧密。

采访结束已到中午十二点半，还有好多问题没来得及请教李扬，如城镇化投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系统性风险问题等。“我现在对里根—撒切尔的供给理论很感兴趣。”临别，李扬又抛出了新题目。

果然是“全面”的李扬，让我们学不胜学啊！

本版编辑 祝惠春
联系邮箱 jrbcbh@126.com

记者：岁末年初，很多研究机构对新的一年经济形势作出研判。2012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中国经济在连续7个季度增速放缓之后，第四季度出现转圜。对于2013年的中国经济，有的预测将不超过7%，有的预测在7%到8%之间，也有很乐观地估计在9%以上。您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

李扬：中国经济经过30余年平均高达9.8%的增长，正在由“结构性增速”进入“结构性减速期”。因此我们判断，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位于8%左右的较前略低的平台上。而且，此轮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周期性的，更非政策性的，而有着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记者：怎么理解结构性减速？

李扬：经济增长是由很多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相关的结构可以列出很多，其中最重要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首先，从劳动、资本、技术进步三

大生产要素结构来看。劳动力的增长是支撑我们过去30余年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每年1000多万农民工进城务工，加入劳动大军，有效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这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从资本投入来看，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将导致中国几十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趋于下降。随着储蓄率开始下降，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至于技术进步，我们当然

希望它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弊端。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自然导致未来的经济增长趋于下降。

其次，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与此对应的，正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它是环境的可持续，您认为GDP的水分体现在哪些方面？

记者：您讲到，要把增长中的水分挤出来。有的人说挤水分，挤的是统计数据的水分，您认为GDP的水分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扬：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存在虚高成分，过高的增长成本、产能浪费和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令我们“实在”享受到的增长成果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摒弃唯增长速度发展模式，主要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

李扬：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存在虚高成分，过高的增长成本、产能浪费和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令“实在”的增长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摒弃唯速度的发展模式，重要内容之一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在我看来，这个水分主要是指统计统计数据的水分。常有外国朋友问我，中国的统计数据中的水分有多大？我的回答是，从专业角度看，表现为瞎编数据的“人造水分”已经大规模减少，但是，增长的外延水分、

内涵水分和生态破坏水分等三类水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其一，增长的外延式水分。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在当年是内需，可提高经济增长率，而在来年则会形成供应，需要新的内需去“吸收”，如此循环往复。基于这种循环关系，我们要研究两类问题：一是过去的投资是否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二是如果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是否存在更多新增需求来“吸收”这些新增供给？简言之，关键要看投资能不能形成有效供应。如果这些投资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生产出的产品又都能被消费所吸收，那么，这种增长是无水分的；反之，如果投资不能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进一步，有些投资的确形成了生产能力，但是，生产出的东西形成积压卖不出去，而且是在大量人群收入水平未能提高，从而消费力不足的同时出现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与这种状况对应的经济增长便是水分。

其二，增长的内涵水分。我们知道，经济学的内容十分庞杂，但从根



漫画 高妍

基本上说，就是探究“最大”和“最小”的关系，展开一点说就是两句话：以最小的投入得到定量的产出；或，以定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这些年来，我们日子比较好过，GDP增长很快，财政收入更有跳跃性增长，官方外汇储备也达世界第一。于是，在发展生产和各项事业过程中，我们比较多地强调投入，甚至不计成本地投入，强调增加贷款、减免税收、“给政策”等等，但很少顾及产出，更很少考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我们的经济效益提高不快，有些领域，有些时候，甚至有所下降。简言之，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依靠更少的投入便可实现；或者，依托目前的投入，我们事实上可以实现更高的产出。这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损失，应当被视为增长的内涵水分。

其三，生态破坏的水分。过去30

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很清楚，所有这些变化均非周期性的，更不是政策性的，而是经济成长阶段转移使然。这是一个自然的、发生在实体层面的过程。在历史上，发达经济体也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记者：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期的判断，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势的判断，二者矛盾吗？

李扬：不矛盾。我希望强调的是，我们说中国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感觉不那么令人振奋，但是，结构性减速更多的是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和机遇。抓住这一机遇，我国经济运行将全面转移到尊重规律、重视质量、提高效益和可持续的轨道上来。沿着这一发展轨道前行，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被压去水分，更为真实，从而可能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多真正的福祉。总之，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是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证。

摒弃唯增长速度发展模式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存在虚高成分，过高的增长成本、产能浪费和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令我们“实在”享受到的增长成果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摒弃唯增长速度发展模式的要点，主要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

记者：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3年经济工作时，明确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您对这四个“定语”如何理解？

李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我们要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对速度的这四个“定语”，跟过去的要求有很大不同，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以前讲“平稳较快”、“又好又快”，但实际工作中落实的都是“快”。现在的提法落在了质量、效益上，重申了尊重经济规律和可持续性，这些都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

尊重经济规律，很多文件里都没有这样强调了，作为经济研究者，读起来十分亲切。强调尊重规律，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支撑经济增长和发展变化的因素及其结构，不是拍脑袋，不是根据主观好恶，而是要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求得最好的发展结果。要讲求质量和效益。在这里，质量是和数量相对应的，效益是和投入产出相关联的。这意味着，要切实改变求量、求快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记者：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对宏观政策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李扬：鉴于我们对经济发展进入结构性减速期的判断，未来5年到1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宜从“平稳较快”转变到“稳健增效”上。所谓“稳健”，就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并依据它的趋势变化进行增速目标调整，宏观政策不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所谓“增效”，就是要尊重经济规律，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可持续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并以此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风险。相应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从行之多年的需求管理，全面转变到以完善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供给管理上，尤其是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消除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对通货膨胀保持高度警惕，更应研究通货膨胀的新形式和应对的新举措。近年来，全世界的货币当局都印钞票“放水”：美联储4次量化宽松在前，欧洲央行启动最后贷款人机制随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稳便已令日本央行制定通货膨胀目标，中国自2009年推出4万亿投资以来一直受困于货币信贷供给过多，再加上密如蛛网的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处

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但各国政府依然热衷于放水，大有“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之势。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们要把守住。虽然今年CPI不高，但今后不可小觑。守住CPI，是未来的重点，不要被需求管理所诱惑，要在提高效率、提高质量上作文章，要在创造有效的供给机制上下功夫。

记者：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间接调控所依托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今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您既是中国金融学会的副会长，也是中国财政学会的副会长，请您谈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怎样协调配合，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李扬：在最近几次中央有关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十二

五”规划纲要中，也有同样的表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领域都是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对象都是货币资金，这就决定了两大调控体系必须协调配合，政策效应必须“内洽”，至少应不相矛盾，从而实现“1+1>2”。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和体制，在某些情况下，两大政策尚有掣肘的问题存在。

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初步想来，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关键点大致有七个方面：其一是政策配合态势。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所松、紧、中性三种状态。简单地组合，至少可有6种状况，如“松/松”、“松/紧”、“紧/松”等。于是，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

财政货币政策需协调配合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从行之多年的需求管理，全面转变到以完善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供给管理上，尤其是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消除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财政货币政策应密切协调配合，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如此看来，我们行之十余年“积极+稳健”的提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其二是国债政策。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鉴于此，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三，中国进一步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建设。未来，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工业化一样，城镇化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但是，由于兼具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将占主导地位，城镇化的资金需要至少有所松、紧、中性三种状态。简单地组合，至少可有6种状况，如“松/松”、“松/紧”、“紧/松”等。于是，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

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如此看来，我们行之十余年“积极+稳健”的提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其二是国债政策。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鉴于此，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三，中国进一步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建设。未来，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工业化一样，城镇化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但是，由于兼具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将占主导地位，城镇化的资金需要至少有所松、紧、中性三种状态。简单地组合，至少可有6种状况，如“松/松”、“松/紧”、“紧/松”等。于是，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

使用问题，在我国将越来越重要。各国经验显示，财政全包和完全依赖金融机制，都不可持续；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几大“支柱”。这中间，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层面可谓“犬牙交错”。其五，财政和金融之间的资金联系问题。由于财政资金广泛地存放于央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央行具有经理国库的功能，财政、金融两大部门的资金联系堪称“剪不断、理还乱”。因此，确定财政、金融两大部门资金联系的规则，便是一件大事情。其六，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官方外汇储备管理以及相应的汇率政策的责任归属等，历来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方能有效处理的大问题。在我国，这一问题刚刚破题。其七，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任务日趋复杂和紧迫，宏观调控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已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形成前瞻、全面、统一、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并据此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磨合甚至进行斗争。倘若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形成合力，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将处在极为不利的地位。其他的不说，我国近年来在G20峰会及一系列相关会议上的经历，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不协调的弊端了。